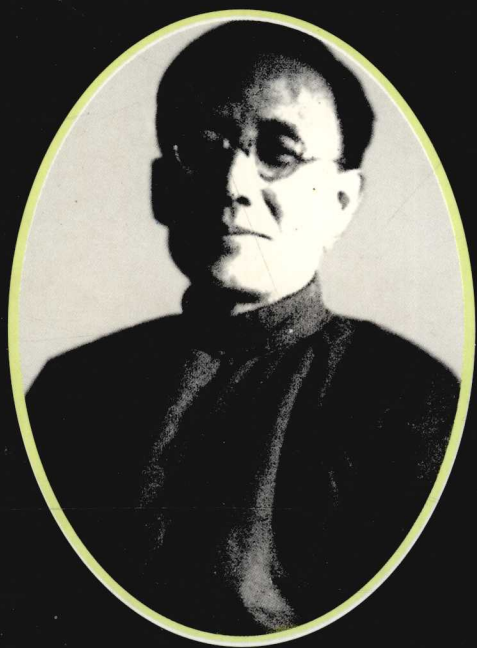


我看契沫若

尤九州 著



香港天马图书有限公司

我看郭沫若

著者：尤九州

出版发行：香港天马图书有限公司

香港上水新成路一百二十三号三楼

电话：二六七零六六三三

传真：二六七零一三八二

定价：港币二十二元

人民币二十一元

二零零三年十二月初版·香港

国际书号：ISBN 962-450-175-0 / D·46888



翻印必究

版权所有

前 言

在中国现代、当代文学史上，郭沫若是一个复杂的存在，对他的研究，要想取得一点小小的成绩，也必须作出相当大的努力。尤九州这样做了。他通过大量的阅读和采访，搜集了足够多的史实材料，本着学术道德、学术人格之规范原则，以严肃认真的科学态度和实事求是的精神，充分证实和阐明了郭沫若与共产党的关系及他的人格问题。尤其书中《郭沫若的人格问题》一文，可以说是近百年来很少出现的有关评述郭沫若人格问题的最为全面、最为中肯的一篇力作。该文就郭沫若在信仰、信用、金钱、婚恋家庭、反胡风运动，“文化大革命”等诸方面的人格问题进行了多层次、多角度的审视和考察，从而不仅可使读者对郭沫若的人格问题有更全面、更深入的了解；对郭沫若与鲁迅、与周扬、与胡风，胡风与周扬，周扬与鲁迅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会有更进一步的新认识；同时也为解答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中的一些悬念疑点，提供可资参照的依据。

总之，尽管这本书尚存有时言语偏颇，感情激越，论证过于繁复等不足之处，但读了它，一定会有所收获。

卷 首 语

他（黑格尔）忘记了“特殊的人格”的本质不是人的胡子，血液、抽象的肉体的本性，而是人的社会特质，而国家的职能等等只不过是人的社会特质的存在和活动的方式。因此很明显，个人既然是国家职能和权力的承担者，那就应该按照他们的社会特质，而不应该按照他们的私人特质考察他们。

——马克思《黑格尔法哲学批判》

人是多么的虚幻啊！是多么的奇特、多么的怪异、多么矛盾的主体、多么奇观啊！既是一切事物的审判官，又是不确定与错误的渊藪；是宇宙的光荣而兼垃圾。

——帕斯卡尔《思想录》

他（歌德）这个人确也是最不容易了解

的。他同时是 Faust, Uebermensch^①；他同时又是 Mephistopheles, Jeufel, Hund^②。

——郭沫若

真正的人在人的内部，在外表的背后，在灵魂的深处。

——雨果

最伟大的人物永远通过一个弱点与他的世纪相联系。

——歌德

真正的光明决不是永没有黑暗的时间，只是永不被黑暗掩蔽罢了；真正的英雄决不是永没有卑下的情操，只是永不被卑下的情操所屈服罢了。

——傅雷

① 德语，郭沫若译：“浮士德，神、超人。”

② 德语，郭沫若译：“靡非斯特匪勒斯，恶魔，狗。”

考虑到种种障碍，两点之间最短的一条线可能是一条曲线。

——伽利略

精神不是任何人的仆从，我们才是精神的仆从。我们没有别的主子。我们生存着是为了传播它的光明，捍卫它的光明，把人类中一切迷途的人们集合在它周围。

——罗曼·罗兰

人生不是一支短短的蜡烛，而是一支由我们暂时拿着的火炬，我们一定要把它燃得十分光明灿烂，高高举起，然后交给下一代的人们。

——萧伯纳

我的本分就是把我这个时代和后代的教化工作担当起来：从我的工作中产生出未来各代人的道路，产生出各民族的世界史。我的使命就是论证真理，使人类感受着尊严和崇高；我

的生命和我的命运都微不足道；但我的生命的影响却无限伟大。我是真理的献身者；我为它服务；我必须为它承做一切，敢说敢作，忍受痛苦。要是我为真理而遭受灾难，要是我为真理而殉于职守，我这样做又有什么特别的呢？我所做的不是我完全应当做的吗？

——费希特

知我者，谓我心忧；

不知我者，谓我何求。

——转引自瞿秋白《多余的话》

目 录

郭沫若的人格问题	(1)
(一) 信仰中的人格问题	(1)
(二) 信用中的人格问题	(4)
(三) 金钱中的人格问题	(8)
(四) 婚恋家庭中的人格问题	(12)
(五) 郁达夫“冤案”中的人格问题	(23)
(六) 反胡风运动中的人格问题	(26)
(七) “文革”中的人格问题	(42)
(八) 人格表现综述	(46)
略谈郭沫若的党籍问题及其研究状况	
——与吴奚如、周而复等商榷	(69)
郭沫若确曾脱党	
——与裘燕同志商榷	(106)
郭沫若文学作品中的人格问题	(112)
郭沫若在领袖面前的人格问题	(119)
郭沫若的人格伟大吗?	
——答税海模教授	(128)
说谎的名人名文	
——读《郭沫若同志和党的关系》	(142)
他们在联袂说谎	
——三谈郭沫若的党籍问题	(148)

《郭老归国谁相迎》一文严重失实	(157)
采访郭平英	(160)
中科院郭书记的话错了	(162)
附录:	
这样评价郭沫若太不公平	
——《郭沫若的人格问题》读后	董汉杰 (167)
也谈郭沫若的党籍问题	
——致尤九州、林亦梅二位同志	裘 燕 (175)
《郭沫若全集》中这条注释有误	尤晓苹 (180)
郭沫若同志和党的关系	吴奚如 (182)
关于郭沫若同志的党籍问题	周而复 (185)
一个共产党员的泰然	郭平英 (187)
一个真正革命者的本色	
——郭沫若秘密入党的前前后后	阳翰笙 (193)
郭沫若、李四光、李德全、钱学森等同志入党	
开始过党的生活	人民日报 (196)
学习毛主席	郭沫若 (198)
周而复致作者的信	(203)
林焕平致作者的信	(204)
李一氓致作者的信	(205)
郑超麟致作者的信	(206)
吴奚如的检讨——致卢正言的信(摘要)	(208)
瞿秋白答记者问(摘要)	李克长 (209)
周恩来陈毅和郭庶英的“对话”	郭平英 (210)
毛泽东告知赫鲁晓夫	张树德 (211)
郭沫若的情人于立忱之死	谢冰莹 (212)
本书部分参考资料及其来源	尤九州 (219)
后记	尤九州 (246)

郭沫若的人格问题

郭沫若逝世已经二十年了，但对他的评价很多方面尚未定论，特别是他的人格问题，更是议论纷纭，莫衷一是。有的说他很伟大，有的说他很平庸；有的说他是“青春型”人格，有的则说他是投机分子；有的说他是敢于创造的天才，有的则说他是御用文人；有的说他是独立不羁的英豪，有的则说他是趋炎附势的弄臣；有的说他是一代知识分子的楷模，有的人则不以为然，等等。郭沫若究竟具有怎样的人格，他在现代和当代文化界、知识界、教育界心目中到底是什么形象，在这里我们不做全面评述，只想就其有关的点点滴滴的具体问题谈点看法，供读者参考，也请专家学者赐教。

（一）信仰中的人格问题

严格地说，信仰并不属于人格研究范畴，但在本世纪初的二三十年代的中国，我们宁可把信仰共产主义，追随共产党，视为一种高尚和伟大的人格体现。这时的郭沫若真的信仰共产主义，追随共产党吗？不是。共产主义、共产党对于郭沫若来说，只能算作一种倾向，一种想法，一种愿望而已，始终未形成真正的信仰，尽管在作品中，在一定的场合，他也曾喊“我是个无产者”，“我愿意成为共产主义者”的口号，这正如他自己所坦言的，那“只是文字上的游戏”^①；瞿秋白也认为

这是“吊膀子”^②罢了。



瞿秋白是郭沫若从1925年开始结识的第一位早期中国共产党领导人。经瞿秋白推荐，广东大学不久即决定聘请郭沫若任文学院学长。

下面的例证也说明这一点：

(1) 1926年初，郭去广州之前，他完全了解共产党和国民党之间在政治路线、思想理论上的根本分歧，他也亲自参加过与国家主义者国民党右派的激烈论战；在到达广州时又发生了蒋介石诬陷、迫害共产党的“三·二〇”中山舰事件，而且他从历史中也非常清楚“世界上最黑暗的角落是官场，最黑心的人是官吏；世界上最黑暗的官场是中国的官场，最黑心的官吏是中国的官吏”，但他还是很快加入了有实权的国民党^③，

混入了官场，这时的官场更加黑暗，官吏更加黑心；他们搞的是特务政治，是流氓权力。

(2) 1926年郭曾两次要求加入中国共产党，一次在广州，一次是在年底，他写信给陈独秀，给党组织，言词恳切，态度虔诚，可是1927年真的批准他入党后，不足半年他却又自动脱党^④，携妻挈子擅自逃往日本，“专门研究学术”去了。这时的共产党处于最危难、最需要党员坚定信念，团结一致。

(3) 郭在日本流亡期间，几乎从未发表过政治性的言论声援共产党，无论蒋介石怎样围剿，无论白色恐怖多么严重，社会多么黑暗，人民多么悲惨痛苦，他一直沉默，即令在接到挚友、共产党领袖人物瞿秋白临刑前给他的密信，他也未敢吭一声；就是建国后在《题瞿秋白笔名印谱》中也显得苍白无力，淡然寡味——“名可屡移头可断，心凝坚铁血凝霜，今日东风吹永昼，秋阳皓皓似春阳。”全诗对于杀害瞿秋白的人们未置一词予以谴责。

(4) 1937年回国后，看不出他有归向共产党的意思。周扬要他去延安，他拒绝；陈诚邀他去武汉，他“立即命驾”。不仅如此，他还主动请求吴稚晖介绍前往南京拜谒了汪精卫、蒋介石，受宠若惊，感到浑身温暖，并“恭恭敬敬地向蒋委员长忏悔过去的罪过，要求蒋委员长饶恕他，他要献身党国，将功折罪，回去马上写了《蒋委员长会见记》”^⑤。该文对蒋大加赞许和颂扬，此文虽不长，但接连三次描写蒋的眼睛，如何“眼睛分外的亮”，如何“眼神表示了抗战的决心”^⑥；然而，恰恰相反，这时周恩来副主席正在上海，党内党外人士，公开的秘密的都会见了，他却未与见面^⑦，直到差不多半年后，陈诚电邀他去武汉任国民党第三厅厅长时，才顺便见了周恩来、王明、博古等共产党的首脑。

(5) 郭沫若 1928 年自行脱党之后, 从不要求恢复党籍, 从不主动申请入党, 这好像正如他女儿郭平英所说“与他无甚关系”, 他从来也不关心^⑤。1958 年重新入党时, 他的秘书王廷芳同志说他也未写入党申请书, 需要他入党就公布他入了, 所以后来上级组织部门就查不到他的有关档案, 只得按照于立群的要求和吴奚如、周而复等人提供的虚假材料进行批复。

当然, 我们也不据此认为他信仰的就是三民主义。他加入国民党, 仅仅是为了升官发财, 获得特权, 提高社会地位, 稳定和增加经济收入, 以及其他各种现实利益与好处^⑥。正如任何权力都是自私的一样, 天下人也大都受势利的驱动, 郭沫若能例外吗?

(二) 信用中的人格问题

在中国现代和当代文学史中, 曾经发生过六次宗派主义斗争, 其中两次的直接原因是郭沫若的故意失信。

第一次, 1921 年 5 月初, 茅盾、郑振铎听说郭沫若到了上海, 由郭的熟人柯一岑陪同, 盛情邀郭于闻名的半淞园饭店, 请他加入文学研究会, 帮助把该会的《文学月刊》办好。当时他许诺“尽力帮助”。可是话音未落, 他不仅未予帮忙, 反而在他主办的《创造》季刊广告和《创造》第一卷第一期上就指责文学研究会里的人“垄断文坛”, 是“假批评家”, “存在着党同伐异的劣等精神, 和卑陋的政客不相上下”, 声称要把他们送“到清水粪坑里去和蛆虫争食物”; 并攻击、丑化茅盾, 耻笑他身材短小, 牙齿外露, 像只“耗子”, 从而挑起创造社与文学研究会的首场论战, 涉及批评、创作、翻译等多方面的问题, 前后耗时近三年, 分散了大家的精力, 影响了文学

的正常发展和实绩收获。

第二次是失信于鲁迅。其表现更为不佳，做法更有损于自己的形象。

1927年，郭沫若参加南昌起义失败后，于11月初潜回上海，和情人安琳在内山书店楼上秘密同居半个月，然后回到安娜身边。（公开）不几天，他即主动派蒋光慈、郑伯奇、段可情前往鲁迅住处，邀请鲁迅联合起来，共同“向旧社会进攻”。鲁迅非常高兴，欣然同意，并主张不再另办刊物，恢复创造社过去的《创造周报》，作为共同园地。不久，郭沫若果然于12月3日在上海《时事新报》上刊出《创造周报复活了》的消息，同时公布了特约撰述员的名单：鲁迅领衔，麦克昂（郭沫若）居二，其余还有蒋光慈、冯乃起、张资平、李初梨、杨邨人、黄药眠、穆木天等三十余人。1928年1月1日出版的《创造月刊》第一卷第八期也刊载了内容相同的广告^⑩。

根据当时历史背景，环境条件，以及革命形势的需要，如果郭沫若等出于真诚，联合起来共同对敌，是再好不过的事了。这中间似乎既蕴藉着对鲁迅的尊重和私人情谊，又包含着捐弃前嫌、顾及革命全局的苦衷和大义，可以说是为郭沫若一个方面的人格形象绘上了一笔重彩。然而事实并非如此，那与鲁迅合作的广告墨迹未干，1928年初，由郭沫若、蒋光慈等刚刚创办的《文化批判》、《太阳月刊》等刊物，从第一期就开始哗啦啦连篇累牍发表成仿吾、杨杏邨、郑伯奇、蒋光慈、冯乃超、彭康、叶灵凤、潘梓年等人的文章，围攻鲁迅，（包括人身攻击）说“鲁迅终究不是这个时代的表现者”，“阿Q时代已经过去，我们再不要骸骨的迷恋，而应该把阿Q的形象与精神一同埋葬掉”，把鲁迅和周作人、陈西滢等相提并论，指称他“蒙蔽一切社会恶”，“麻醉青年”，“为布鲁乔亚汩当一

条忠实的看家狗”，是“反动的煽动家”，比“贪污豪绅还卑劣”，是“我们的敌人”，“鲁迅的出路只有坟墓”……

这时的鲁迅还蒙在鼓里，正热切地期盼着与郭沫若他们“联合起来，造一条阵线，更向旧社会进攻”呢！

呜呼！郭沫若等人太令鲁迅失望了！如此失信，背弃诺言，后来郭沫若还屡屡辩称这是因为当时从日本回来的冯乃超、李初梨、彭康、朱镜我、李铁声及成仿吾等不同意和鲁迅联合，责任全在他们，而与他本人无关。

郭的这种辩解是没有根据的，理由也是不充分的。我们中国人中很多集体和互助精神是不够的，但却最善于迎合上司的意愿，有的表现还相当出色；郭是创造社的元帅，只有帅旗指到哪里，兵卒才会奔到哪里，成、冯、杨、郑、李等不肯与鲁迅联合，正说明是郭沫若的旨意，他们决不会单独行动的。郭派人去找鲁迅联合，其实就是郭等共同故意玩弄的花招计谋，故意戏耍、麻痹鲁迅，以便突然袭击，打得鲁迅措手不及，收事半功倍之效。我们不要只看他主动派人到鲁迅那里的热情劲儿，那是表面现象。拥抱鲁迅也正是为了折断鲁迅的肋骨。不然，他们变卦之前，为什么不向鲁迅打招呼？变卦之后，又为什么不立即向鲁迅作出解释？不然，为什么他们能在这样短时间内组织、集中如此之多的稿件一同对鲁迅围攻？即令成仿吾、冯乃超、李初梨、郑伯奇、杨杏邨等人都是像郭沫若一样天才，也绝对办不到，我们从那种毫不掩饰的赤裸裸的态度，赤裸裸的语言，那种冲锋陷阵的劲头，就不难窥见他们背后大帅郭沫若的心理、动机、意图和作用。

我们不仅可从别人的言行里看到郭沫若，郭沫若自己也在赤膊上阵。他在1928年1月1日出版的《创造月刊》发表论文《英雄树》，影射鲁迅是“最丑恶的个人主义者”，其作品是

“最丑猥的个人主义者的呻吟”，“依然还是在文艺市场上跋扈。——酒哟……悲哀哟……我的老七老八哟……好不漂亮的important的颓废派！”这时他刚刚大病（斑疹伤寒）初愈，特别有讽刺意味的是，也就在这同一期的《创造月刊》上还登载着他与鲁迅联合起来的宣传广告。真是典型的一边握手一边踢脚，妙不可言。

另外再举一例——1928年2月27日逃亡到日本去的郭沫若，可以说自身难保，连党籍也不敢要了，但他却仍然没有忘记攻击鲁迅。他一面安排日本作家采访，宣称“鲁迅在中国文坛受着清洗”，借境外媒体非议鲁迅^①，一面用假名假姓撰文对鲁迅大肆诬蔑。请看他1928年6月1日写就的、署名“杜荃”的《文艺战线上的封建余孽》一文是怎样恶意、刻薄吧：“鲁迅是资本主义以前的一个封建余孽”，“资本主义对于社会主义是反革命，封建余孽对于社会主义是二重的反革命”，“鲁迅是二重的反革命人物”，“是一位不得志的法西斯帝”^②……据此，难道我们还能相信郭沫若的自我辩解？还应该说郭沫若对鲁迅失信是偶然的？是误会？是受他人左右的吗？不是的。绝对不是，那是有组织、有步骤、精心策划的预谋。他是“明修栈道，暗渡陈仓”。他到死也不承认“杜荃”二字就是他的化名，可见他当时内心多么阴暗。

如此言而无信，又不惜背后捣鬼，出乖露丑，郭沫若太缺乏大家风度了！

郭沫若其他不信守诺言的事例，更是比比也。如1927年8月，在入党时宣誓要为共产主义奋斗终身，可是才几个月他就背离了共产党^③；1928年2月，周恩来安排他绕经日本去苏联，可是他一到日本就改变了主意，（其实在离沪前他就已暗自决定不去苏联）长期留居日本十年之久；他向妻子安娜表示

她是他的永远唯一的爱人，可是暗地却有多个情人，甚至瞒着安娜去妓院嫖娼^④；1937年他告诉情人于立忱：我马上和安娜离婚，同你一起回上海结婚。可是于真的怀孕了，他反而多方推托、拒绝，以致造成极严重的后果^⑤。（下面详述）

以上的信用问题，特别是对鲁迅的信用问题，责任全在郭沫若一边。有人或许会说，一个巴掌拍不响，责任应该一半对一半。这种认识是不正确的，说法是不公正的。一个巴掌拍不响，如果一个巴掌打在一张脸上，不也会响吗？学者们不要因郭沫若曾任过副总理、副委员长，就百般袒护他。

“人而无信，不知其可。”有关郭沫若的信用问题，暂时就谈到这里。

（三）金钱中的人格问题

1984年，记者、《郭沫若学刊》副主编唐明中访问了郭沫若的夫人安娜。安娜说：“郭沫若在抗日爆发前回到了中国，回去后，他没有给我寄过钱。原来在上海内山书店处我们有些账务手续，在革命后我们一家去到了日本市川。在市川居住期间，我只身两次返过上海，和内山了结完手续，共有好几万元，全部存在内山处。1937年郭回到上海后，由他全部取用了。我拉巴几个孩子，在市川只好去做苦工，就是这样维持生活。”说到这里郭夫人短暂的沉默，然后转身去书柜前，略微翻弄了片刻。看来她是想把辛酸的心情，松弛和减缓。一会儿她坐下，接着说：“战争期间，我是没吃过好东西的呀！养几个孩子，还得下苦力啊！”（《郭沫若秘密归国资料选》第15页，四川社科院编）

在这里安娜除了叙说她郭沫若的不满和她自己的生活艰